

开放经济的政治学： 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

[美]戴维·A.莱克

【内容提要】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兴起，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正在成为很多学者构建和指导研究的主导方法，尤其是在北美地区。作者概括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阐述了开放经济的政治学在利益、制度和国家间议价这三个层面的分析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对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与建构主义进行了对比。中国这个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对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中有关国际市场力量和规模效益递增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开放经济的政治学这一分析方法之所以成功源于其强大的实证基础、严谨的演绎以及广泛的理论背景。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开放经济；交叉学科；建构主义

【作者简介】 戴维·A.莱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9)08-0045-15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这一领域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创建的，学者们试图以此来把握这个新时代的基本特征。这个仍然年轻的领域正在迅速地成熟起来。在一系列早期的研究视角中，开放经济的政治学(OEP)正在成为很多学者构建和指导研究的主导方法，至少在北美地区是这样。^①OEP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整合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工具，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交叉学科。

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国际经济交往的政治学。它是对一个实质性领域的探究，而不是指将经济模型在政治领域进行应用的方法。这个领域所关注的关键问题有两类：第一类，对商品和服务、资本以及人员的跨境流动，国家是如何开放的？会选择

在什么时候开放以及为什么开放？换言之，是什么政治因素决定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在这些问题中，开放需要解释的结果是因变量，(广义的)政治是自变量或因果变量。经济理论假定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国际商业活动——除少数例外——会促进福利的改善；因而，很多政治上比较幼稚的分析家希望能够推动国家向自由贸易发展。相比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则将开放性看做是在历史上稀有并且存在很多问题要进一步解释的现象。

* 本文是笔者在美国加州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期间完成的，它首次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2008年12月9~11日由北京大学政府学院主办、普林斯顿大学尼豪斯全球化和治理中心(Niehaus Center for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赞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会议。在此也对李滨教授的评论表示感谢。

① “开放经济的政治学”这个说法源于Robert H. Bates, *Open-Economy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Coffee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第二类，与国际经济实现（或不实现）一体化是如何影响到不同个人、部门、生产要素和国家的利益乃至国家政策的？在这里，政治是因变量，行为体如何在国际经济中定位是自变量。当然，事实上，这两类问题本身也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起源

随着政治学和经济学在19世纪末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学科，上述问题被打入学术界的“冷宫”。经济学经历了“边际主义”的革命，并且慢慢地演化为一种公理化的科学；政治学转而研究正统的法律制度和机构，两个学科都日趋内敛。^① 这期间，有一些学者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E. E. 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产生过程中政治上互投赞成票的著名研究^②以及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对贸易自由化分配效应的最终证明。^③ 但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各自的学科领域，而未能引发更多学科间的兴趣。即使有少数跨学科的研究，也都是高度描述性的。^④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明确的跨学科领域的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是世界范围内两种相互矛盾但却真实存在的力量发展的结果。^⑤ 在这两个趋势的共同影响下，学者们不得不重新“捡起”那些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致力于研究的同样的问题。

第一，建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的战后西方国际经济制度的成功，将世界引入了一个经济日趋相互依存的新时代。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谈判在削减关税方面的效果充分显现，作为国家间经济往来的一部分，所有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快速上升，这使得学者们开始关注经济联系的深化在政治领域的效应。^⑥ 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新的时代将会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著名论述是“民族国家正在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时代就要结束了”，^⑦ 而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揭示出国际政治一个以“复合相互依赖”为特征的新模型。^⑧ 现在，我们认识到当时突然增长的相互依存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早期信号，但在更多

的时候，全球化被认为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很多发达国家撤销资本管制开始的。今天，仍有很多人相信全球化进程中蕴涵着同样的变革的潜力。

第二，在相互依存“起飞”的同时，这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的政治基础开始出现裂痕，向所有人示意世界经济交换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基础之上。1971年8月，特里芬困境^⑨成为现实，尼克松总统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⑩ 两年后，当主要国家的货币开始相互浮动，二战后的汇率体系崩溃了。肇始于1973年中东战争的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也是导致此次货币动荡的一个原因，它将石油用做一个强大的武器。发展中国家羡慕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功，它们借此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便能够行使相似的市场权力。^⑪

第三，由于自由化和相互依存加深而导致的进口快速增长使得美国产业界开始再度鼓吹更大程度

^① 对早期政治经济学及其轨迹的分析，参见 James A. Caporaso and David P. Levine,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E. E. Schattschneider, *Politics, Pressures, and the Tariff*,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5.

^③ Wolfgang Stolper and Paul A. Samuelson,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9, No. 1, 1941, pp. 58-73.

^④ Raymond A. Bauer, Ithiel de Sola Pool, and Anthony Dexter, *America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2; Ernest H. Preer, *Traders and Diplomats: An Analysis of the Kennedy Round of Negotiations under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0.

^⑤ 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起源的广泛研究，参见 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⑥ Richard N.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⑦ Charles P. Kindleberger, *American Business Abro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07.

^⑧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⑨ Robert Triffin,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⑩ Joanne Gowa, *Closing the Gold Window: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Bretton Wood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⑪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的贸易保护。^⑫ 由于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化，人们意识到国际经济活动并不是一个自治领域——一种能够在政治机器权力之外的自然现象，而是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政治力量斗争的一个产品。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是以高度竞争的国内政策为基础的，如同知识产权后来被看做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国家内部再分配政治的产物。^⑬ 正当分析家们试图理解国际市场上增长和冲突的同步性的时候，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领域就诞生了。

（二）早期的流派^⑭

或许国际政治经济学最早的研究途径是依附理论。依附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由拉美学者创立，在70年代的北美和欧洲非常流行。^⑮ 依附理论后来被它的追随者们表述为一个“学派”^⑯，其中心思想是：贫穷国家（边缘）的经济和发展前景取决于由发达国家（中心）所主导的全球经济。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指出，依附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贫困国家不仅仅是没有得到发展，而是在一个永远不利于它们的国际经济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⑰ 因此，不发达国家不能按照工业化国家以前的发展模式走，而必须寻求新的更加自主的发展战略。

尽管依附理论早期的地位很突出，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衰落。原因有二：其一，它的支持者没有能够发展出一个统一的、逻辑一致的、经得起实证检验的不发达理论，或者是至少有一个在严密性和解释力方面能够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和发展理论相竞争的理论。其二，这个理论基本上被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所证伪，与依附理论所有的期待相左，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凭借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起飞”。^⑱ 尽管如此，依附理论触及的国际不平等、不均衡增长和国家对国际经济势力的控制等问题仍然是当今全球化论争的核心问题。

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二种途径是霸权稳定论，它也更多地被看做一个学派而不是一个理论。^⑲ 该理论主要基于英国在19世纪中期和美国在20世纪中期的经历，其结论为单一霸权国家是国际经济的开放的必要的条件。

霸权稳定论的第一个分支是笔者提出的“领导权理论(leadership theory)”，主要依据集体行动的经济

文献。^⑳ 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国际市场失灵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他的结论是“要想使世界经济稳定，就需要一个‘稳定器’，并且只能有一个”。^㉑ 经济学家贝思·亚伯勒(Beth Yarbrough)和罗伯特·亚伯勒(Robert Yarbrough)扩展了这个基本观点，认为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必然带来更多的资产和机会主义的风险。^㉒ 在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① Judith Goldstein, "Ideas,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1988, pp. 179-217.

^②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1972.

^③ 另外一种方法将理论划分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参见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④ 依附理论的基石见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该书最早是1967年用西班牙语出版的。一种早期的理论方法参见 Raul Prebisch, *Towards a New Trade Policy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64; Ruy Mauro Marini, "Brazilian Sub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23, No. 9, 1972, pp. 14-24; Celso Furtado, "The Concept of External Dependence in the Study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 K. Wilb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Osvaldo Sunkel,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External Dependence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6, No. 1, 1969, pp. 23-48.

^⑤ G. Palma, "Dependency: A Formal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or a Methodology for the Analysis of Concrete Situations of Dependency," *World Development*, Vol. 6, 1978, pp. 881-924.

^⑥ Andre Gunder Frank,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Vol. 28, No. 4, 1966, pp. 17-31.

^⑦ Stepha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⑧ 关于霸权稳定论的细节参见 David A. Lake,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aked Emperor or Tattered Monarch with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4, 1993, pp. 459-489.

^⑨ Robert Pahre, *Leading Questions: How Hegemony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⑩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305.

^⑪ Beth V. Yarbrough and Robert M. Yarbrough,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Williamson)关于市场和等级制研究的基础上,^①他们将霸权看做是执行合同和维持国际秩序所必需的一种等级形式,以便确保国际交换和投资的实现。但是,领导权理论没能说明为什么有能力有意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权集团一定要包括一个霸权国家而且只能是一个国家。^②至少,在理论上,小的国家集团同样有这样的能力,它削弱了可观察到的霸权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基础。

霸权稳定论的第二个分支笔者称之为霸权理论,它假定占有主导地位的大国对自由和开放的国际交换具有强烈的偏好,因而会强迫、诱导或说服其他国家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其市场。^③霸权理论并不关注集体行动问题,而是假定国家对国际经济政策有不同的偏好,而最终的结果是战略博弈。霸权理论学家认为,要么国家的行为有复杂的效用函数,其变量不仅包括国家财富而且包括权力和稳定;^④要么它们巨大的国内市场和规模产业的高回报赋予了霸权国在贸易领域的战略优势,使得它们试图通过鼓励他国采取自由贸易锁定这个优势。^⑤尽管这些观点看似合理,但它们却不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霸权稳定论预测,国际经济将会变得更加脆弱,并最终回归到复兴的保护主义和相互排斥的经济集团中。^⑥国际经济中问题和紧张局势的增加以及美国滑向某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为这种观点增加了可信性。但是,开放的国际经济并未分崩离析,而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出现了。8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转向机制和制度来解释国际经济出人意料的大发展。^⑦及至90年代初,苏联解体,欧洲和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年的滞胀,美国再度称霸,霸权稳定论几乎被遗忘了。这种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所有的国家并不是生来就平等的,有的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开放更为重要;大国对他国有着特别的影响力。尽管这些推动霸权稳定论向前发展的直觉感知和一系列观点很少被构建国家间经济合作新模型的理论家们所接受,而它们如今又重新被提及,部分原因是由于开放经济学对国际经济框架内议价的关注,但这些观点仍然是这个研究途径中最重要的局限性之一。

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种研究途径主要关

注发达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中的国内利益。^⑧务实的政治观察家们,当然还有如谢茨施耐德这样的早期学者^⑨都曾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不过,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国内理论只是在近期才刚刚出现。早期的奠基性著作是金德尔伯格关于“集团行为和国际贸易”的论述,^⑩后来在政治学领域还有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对第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研究,^⑪在经济学

^① Oliver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and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② David A. Lake, “Beneath the Commerce of Nation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8, No. 2, 1984, pp. 143–170;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1985, pp. 579–614.

^③ Robert Gilpin, *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Robert Gilpi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K. Knorr and F. N. Trager, eds., *Economic Iss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Lawrenc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77.

^④ 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1976, pp. 317–347; Joanne Gowa,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⑤ David A. Lake, *Power,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American Commercial Strategy, 1887–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⑥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⑦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⑧ 作为这种国内利益集团分析方法的补充,至少在政治学领域,是一种寻求把握发达国家间制度差异特征的国内结构模型。参见G. John Ikenberry, David A. Lake,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The State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eter Katzenste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⑨ E. E. Schattschneider, *Politics, Pressures, and the Tariff*, 1935.

^⑩ Charles P. Kindleberger, “Group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9, 1951, pp. 30–46.

^⑪ Peter Alexis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8, 1977, pp. 281–300.

领域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Caves)启发性地提出了贸易决策的不同模型。^⑫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的发展中,政治学家们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建立了贸易政策的需求理论或社会理论。^⑬几乎在同一时期,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内生关税理论”,强调了国内利益和游说的重要性。^⑭该研究的关键是行为体在解决自身集体行动问题和结成大多数联盟方面的不同能力,而最终,进口方在政治上战胜了出口方的利益,生产商战胜了消费者,集中的利益战胜了分散的利益。重要的问题是:这些集团是如何建构和组织起来进行政治行动的。总之,关于国内利益的早期研究为我们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创立了基础。

二 开放经济的政治学

在这些早期的流派中,作为国内利益研究的一个直接继承者,开放经济的政治学(OEP)出现了,并在20世纪90年代主导着北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OEP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但是在分析中更明确地纳入了政治变量,OEP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OEP将公司、部门或生产要素作为分析单元,从每个单元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来判断它们在经济政策上的利益。其次,它将政治制度看做是一种整合利益(或多或少带有偏见),允许在其基础上建立相互竞争的不同社会利益之间议价的机制。最后,在需要的时候,它将国内不同的社会利益引入国际层面上国家之间的议价中来。理论上,广泛纳入的假设使得各要素能够连接为一个更加完整的整体,尽管在实践中合并仍然是有缺陷的。

OEP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像其他模式一样,它通过界定已知和未知、事实和反常来引导研究的前进。从最初的贸易政策背景看,OEP理论被扩展到货币和金融关系^⑮、外国直接投资^⑯、移民^⑰、国外援助^⑱、规制^⑲、公司治理^⑳以及全球治理^㉑。如今,它构建了一个分析对外经济政策众多领域的全面分析框架。

(一)利益

在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中最基本的要素是利益,

^⑫ Richard Caves,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al Choice: Canada’s Tariff Structur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 1976, pp. 278–300.

^⑬ Timothy J. McKeown, “Firms and Tariff Regime Change: Explaining the Demand for Protection,”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2, 1984, pp. 215–233; James H. Cassing, Timothy J. McKeown, and Jack Och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ariff Cycl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1986, pp. 843–862; Jeffry A. Frieden, “Sectoral Conflict and U. 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14–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1988, pp. 59–90; Helen V. Milner, *Resisting Protectionism: Global Indust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⑭ J. J. Pincus, “Pressure Groups and the Pattern of Tariff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3, 1975, pp. 757–758; Real P. Laverg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 S. Tariffs: An Empirical Analysis*, Toronto: Academic Press, 1983; Robert E. Baldw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 S. Import Poli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Stephen P. Magee, William A. Brock, and Leslie Young, *Black Hole Tariffs and Endogenous Policy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in General Equilibriu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⑮ Jeffry A. Frieden, “Capital Politics: Credito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8, No. 3/4, 1988, pp. 265–286; Jeffry A.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1991, pp. 425–451; William Bernhard, J. Lawrence Broz, and William Roberts Clark,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tary Institution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⑯ Nathan M. Jensen, *Nation – States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ablo M. Pinto and Santiago M. Pinto, “The Politics of Investment: Partisanship and the Sectoral Al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20, No. 2, 2008, pp. 216–254.

^⑰ David Leblang, Jennifer Fitzgerald, and Jessica Teets, “Defying the Law of Grav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7.

^⑱ Helen V. Milner, “Why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Aid and Domestic Principal – Agent Problems,” in D. G. Hawkins, D. A. Lake, D. L. Nielson and M. J. Tierney, eds., *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⑲ Walter Mattli and Ngaire Woods, ed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Regul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John Richards, “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Aviation Marke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1, 1999, pp. 1–37.

^⑳ Peter Gourevitch and James Shinn, *Political Power and Corporate Control: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㉑ Miles Kahler and David A. Lak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 Economy: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rans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或者说一个个体或集团是如何受到某个政策影响的。在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埃尔赫男·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所提出的、被奉为经典的模型中,^①从某一政策中获益的行为体将运用其政治资源(通过游说)来获得这个政策,直至其所付出努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相反,从某个政策中利益受损的行为体则会去游说反对这项政策。简言之,对于从不同政策中的赢家和输家来说,最根本的要素就是政治。

理论的差别在于它们所假定的分析单元。虽然几乎所有的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以个体为分析单元的,但是,当某项政策会对某些个体产生相同影响的时候,这些个体就会被看做是组成了一个同质的集团,或者为了分析的方便,把它们当做一个单一的行为体来对待。在一些开放经济的政治学理论中,个体是最原始的,但更多的时候被当做分析单元的是公司、部门或生产要素。

OEP运用经济理论来推论什么类型的个体可以被假定分享了共同的利益。在这些经济理论中,一个最大的分野存在于李嘉图-瓦伊纳(Ricardo-Viner)的国际贸易的具体要素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的国际贸易理论之间。前者假定在典型的情况下,资本和土地在具体的行业中是固定的,因而资本和劳动力在贸易政策上的利益是相似的;后者的假定是所有的要素可在国家内部各职业之间流动,因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将拥有不同的利益。斯蒂芬·马吉(Stephen Magee)试图分辨这两种假设哪一种更适于研究资本和劳动力在1973年贸易法案中的游说行为,在他的研究中更支持具体要素理论,因为资本和劳动力几乎总是站在拟议中立法的同一边。^②这意味着,部门才是贸易政策理论中最适合的分析单元。^③近期,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Hiscox)通过比较不同产业的收益率来判断要素的流动。^④他将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业化国家作为案例,发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引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流动通常都增加了,而从20世纪中期到现在,要素流动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反过来也被过去一个世纪中贸易政治利益的结构变化所证实。它意味着在过去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分析单元实现了从部门到要素再到部门的演变。

在界定了相应的分析单元之后,OEP进一步通过不同经济政策的分配效应推导出利益——对不同政策的偏好——以及一个集团与其他集团相比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⑤基于对一个公司生产状况的了解,^⑥OEP预测它是如何受到影响的,例如,它是如何受到扩大国际开放程度政策的影响。部门之间的区分也有类似的特点,而生产要素的区分则取决于其相对世界经济的稀有程度。^⑦按照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的均衡条件^⑧——货物和要素在国际边界之间的流动与它们对相对收益率的影响相当——我们可以预期,要素是如何受到各领域经济政策影响的,然后据此判断它们在这些政策上的各自利益。

从经济理论来推导利益是OEP的一个根本创新,也是这种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独树一帜的特色。利益的判断不是简单地通过假设或从我们试图解释的政治行动中推测,而是来自于一个已有的、能证伪的、经得起实证检验的理论,这也使得整个理论建立

^① Gene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 "Protection for S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4, 1994, pp. 833-850.

^② Stephen P. Magee, "Three Simple Tests of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in P. Oppenheimer, ed.,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ondon: Oriel Press, 1980.

^③ 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E. Baldwin)和斯蒂芬·马吉(Stephen P. Magee)发现了更多支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证据。参见Robert E. Baldwin and Stephen P. Magee, "Is Trade Policy for Sale? Congressional Voting on Recent Trade Bills," *Public Choice*, Vol. 105, No. 1-2, 2000, pp. 79-101。

^④ Michael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⑤ 关于偏好的研究,参见Jeffry Frieden, "Actors and Pre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avid 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⑥ Peter Alexis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⑦ Wolfgang Stolper and Paul A. Samuelson,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9, 1941, pp. 58-73;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⑧ Robert A. Mundell,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7, No. 3, 1957, pp. 321-335.

在一个合理演绎的基础之上。^⑨而OEP本质上的特色和解释力也正是基于这种创新。

(二)制度

制度整合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尽管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并为相互对抗的集团设置了议价的规制。在制度化程度不高的政治体系中,例如,在国际体系或“失败的国家”,政治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是强制力;一般来说——如果进行某种程度的简化——我们认为赢家将是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一方。在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环境中,大多数国内政治体系,既定的规则和程序通常是不同集团长期较力的反映。不过因为制度常常可以为社会提供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增强承诺的可信度,因而能够具有一种独立的身份和结构,并且起到在短期内化解、有时甚至是抵消强大力量的作用。简言之,制度决定了政治“大市场”中使用的货币以及不同政治资产是如何估价的。

政治学家以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正在深入研究制度是如何整合利益的。OEP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与其保持了一致,但这些文献并不直接涉及经济政策。^⑩在这些文献中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其中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观点包括:

第一,大选区制——最极端的例子是整个国家是一个单一的选区——倾向于提高总体福利的政策,如货物、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小选区制的政策会更有利于贸易保护主义的集团。^⑪第二,一个政治体系中的否决权越多(即有权力妨碍政策实施的行为体),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降低了要进行政治或经济改革承诺的可信度,^⑫与此同时,也削弱了政府有效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⑬第三,立法参与外交决策的制度化为国家行政人员和国外伙伴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减少了违背协议的问题,并增加了改变政策的难度(否决权),增加了合作的可信度与前景。^⑭第四,比例代表制度带来了政策的稳定性和不灵活性,意味着改革决心的可信度减少,有效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降低;而多数选举制度则使得政策更为灵活和不稳定,它对可信度和有效应对能力的作用也正相反。^⑮

很多时候,通过在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设定政策的“回归点(reversion point)”和确定可能的补

偿性支付(sidepayment)、跨问题交易以及互投赞成票,制度也可以为集团之间的议价设定条件。例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认为,欧洲小的开放经济体制定了组团制度(corporatist institutions)来推动经济调整,通过资本-劳动力合作来缓和工资需求,以补偿性社会福利制度来降低个人在经济

^① 新的研究认识到,利益要远比个体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复杂得多。尽管经济利益是贸易政策选择的一个强大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却不能涵盖所有的解释。参见Kenneth Scheve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Perceptions of American Worker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Kenneth Scheve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Public Opin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S. Bowles, P. Bardhan and M. Wallerstein, eds., *Globalization and Egalitarian Redistrib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研究还表明,宗教和性别差异对于个体如何感受和解释它们在经济政策上的利益是很重要的。现在,对国家间在贸易问题上不同态度的研究也包含了重要的见解。这项研究使得原本可以从具体要素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清楚预测出的利益观念复杂化了。参见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Religion and Preferences for Social Insur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No. 3, 2006, pp. 255-286; Brian A. Burgoon and Michael J. Hiscox, "The Mysterious Case of Female Protectionism: Gender Bias in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Judith Goldstein, Yotam Margalit and Douglass Rivers, eds.,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3; Judith Goldstein, Yotam Margalit, and Douglass Rivers, "Producer, Consumer, Family Memb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ttitudes and Family Status,"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2007。

^② Gary W. Cox,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eorge Tsebelis, *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2002.

^③ Ronald Rogowski, "Trade and the Variet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 1987, pp. 203-223.

^④ Peter F. Cowhey,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2, 1993, pp. 299-326.

^⑤ Andrew Macintyre, "Institutions and Investor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1, 2001, pp. 81-122.

^⑥ Lisa L. Martin, *Democratic Commitments: Legisla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⑦ Ronald Rogowski, "Institutions as Constraints on Strategic Choice," in D. A. Lake and R.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9.

不景气时的成本。^①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②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tt)^③和其他学者将这个观点应用到所有的国家，发现很多证据表明存在着一种“嵌入的自由主义”妥协，^④其中，社会福利政策是资本为经济开放所支付的成本。相类似，多议席的选区(如在日本)推动了特定的利益和政策，带来了低效率的社会寻租行为和经济的不灵活性。^⑤

OEP认识到，仅对利益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这一点是此前的国内利益研究方法没能做到的。尽管它得到了详尽的说明，但是利益只有通过政治制度才能得到折射和体现，政治制度对于政策选择常常有着一种独立的影响。不过，OEP仍然拥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仅对利益而且对制度进行明确的理论化的坚持。

(三)国家间的议价

当国内利益通过制度整合为一项国家政策时，国家通过议价来影响彼此的行为及决定其行动的综合结果。^⑥这是OEP方法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

国家间最有可能出现议价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的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外部性影响的时候。^⑦在很多情形下，若干小规模经济体的集体选择会导致外部性的产生。在这种所谓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个体的最佳选择集合起来会产生次优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但它们仍然是很难解决的。^⑧即使当国家并不直接受到其他国家行动的影响，它们也可能会推动国际准则，可能会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来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或改变可能出现的违规者的行为。推进有关发展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on Development)”的努力或许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中准则驱动行为的例证。^⑨尽管如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理论仍然坚持假定，议价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些重要外部性的结果。

OEP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国际制度是如何构建国家间的议价并影响结果的。如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所提示的那样，现在制度主义主要有两种方法，它们把握了议价博弈的不同但却互补的层面。^⑩第一种方法通常被认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它将制度看做是推动国家合作的成套规则。通过提供信息、创造事务之间的联系以及减少交易成本，制度帮助国家实现帕累托改进的议

价。^⑪当前的研究超越了20世纪90年代主导政治学的空洞的辩论——即国际制度是否有任何作用——而关注制度是如何被设计以便实现其成员国的目标的。^⑫

尤为重要的是，国家如何通过国际制度来增强其承诺的可信度。由于所有的协议都必须是可自我实施的，因此只有当协议可信或者在未来情况下协议的执行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时候，国际合作才成为可能。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主权债务的问题，但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广到其他类型的交易。迈克尔·汤姆兹(Michael Tomz)研究了在国际借贷中，当借款方偿还贷款的意愿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以及国家是如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③ Geoffrey Garrett, *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S.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⑤ J. Mark Ramseyer and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⑥ 这包括将成本或收益强加给他国的单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缺少公开的谈判，但仍然可以被认为是议价。

^⑦ Helen V.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⑧ Bruno S. Fr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4, chapter 7; Todd Sandler, *Global Challenges: An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⑨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2.

^⑩ Stephen D. Krasner,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3, 1991, pp. 336–366.

^⑪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1984; Kyle Bagwell and Staiger and Robert W.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⑫ Judith Goldstein, Miles Kahler, Robert O. Keohane,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eds.,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 Barbara Koremenos, Charles Lipson,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何运用(或滥用)其信誉来解决这个问题的。^①兰德尔·斯通(Randall Stone)研究了主权借贷中的实施问题，如果贷款方对借款方不能偿还贷款的行为具有不实施惩罚的政治动机，实施问题就会产生。^②戴欣媛(Xinyuan Dai)的研究与制度更直接相关，她认为，即使是弱势的国际制度，也会赋予非国家和国内行为体提供信息和增强国家遵守国际规则的权利。^③劳伦斯·布洛兹(J. Lawrence Broz)发现，缺少国内透明度因而没有其他途径使稳定货币的承诺取得可信度的国家，更可能采取固定汇率制。^④

第二种制度主义方法所关注的是关于合作中收益的议价。如果说第一种方法认为制度将国家推向帕累托前沿，这种学派强调的则是前沿上的“零和”移动。在大多数议价模型中，再分配博弈的关键变量包括各方保留点的相对成本、时间水平线(折扣率)以及做出可信威胁和承诺的能力。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论证说，虽然第一种方法认为，长长的“未来的阴影”能够推动合作(即所谓的无名氏定理)，但是它也会提高相关方议价的风险而妨碍合作的达成。^⑤

通过对再分配冲突的关注，第二种方法暗示合作并不必然会改善社会福利。这个逻辑与芝加哥学派最先提出的经济管制的观点相似。^⑥集团可以利用其国家政府来建立国际制度，以便限制竞争并创造寻租的条件。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将国际咖啡组织描述为由大型咖啡生产商和发达国家咖啡烘焙巨头联合组成的卡特尔，以达到限制供应和提高价格的目的，而不顾咖啡消费者的利益。^⑦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在国际航空制度中发现了类似的卡特尔行为。

不过，OEP第三个层面的分析仍然没有能够完全融入其他层面的研究中。正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⑧和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⑨所揭示的，国内利益和制度能够影响国际议价和合作。一般来说，“谢林猜想”(即国内约束提高了国家领导人在国外议价的实力)看上去是成立的。这些例子表明，OEP的不同分析层次被假定为向一个方向汇集：从利益到制度再到国际议价。但是，对“颠倒的第二种意象(second image reversed)”^⑩或者国际制度是如何影响国内利益或制度的整合的研究，却少有关注。

三 开放经济学与建构主义比较

像政治学的很多领域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方法之间出现了分裂。^⑪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OEP是理性主义的同义词，

^① Michael Tomz,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overeign Debt Across Three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Randall Stone, *Lending Credibilit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Xinyuan Dai,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Polic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 J. Lawrence Broz, “Political System Transparency and Monetary Commitment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4, 2002, pp. 861–887.

^⑤ James Fearon, “Bargaining,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2, 1998, pp. 269–305.

^⑥ George J.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No. 1, 1971, pp. 3–21; Samuel Peltzman, “Towards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9, No. 2, 1976, pp. 211–240.

^⑦ Robert H. Bates, *Open-Economy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Coffee Trade*, 1997.

^⑧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27–460.

^⑨ Helen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⑩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p. 881–912.

^⑪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主义分支，参见 Rawi Abdelal, *Natio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Econom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Rawi Abdelal, *Capital Rules: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Fin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ichael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Rules for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rk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effrey Chwieroth, “Neoliberal Economists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1, 2007, pp. 443–463; Craig Parsons, *A Certain Idea of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Sinclair Timothy, *The New Masters of Capitalism: American Bond Rating Agencies and the Politics of Creditworthin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而建构主义分支虽然人数较少但在北美地区仍然是一支有影响力的学派。^① 尽管二者之间存在众多不同的观点,但在笔者看来,它们最关键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或是现实世界的本质,而在于认识论,或者更具体地说,在于什么才能称之为对某个现象的“满意”的解释。这是不同模式之间最重要的差别质疑。与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围绕世界政治的“科学”研究问题所发生的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二次大争论相似,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认识论的分歧由来已久。^②

OEP 采用了一种局部均衡或比较静态的分析方式对待理论和知识。OEP 框架内的研究进展是通过把一种政治经济环境中众多变化的因素划到一边当做外生变量不管,以便单独区分或研究某一种因果效应而将其看做是外生变量。^③ 例如,我们可以将利益“来自于”哪里的问题放到一边不顾,而研究不同特征的国内制度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将这些利益整合在一起的。如果运用古典的假说演绎法,假设的验证就会以这种形式:当所有其他条件保持不变,X 的变化会导致 Y 的变化。当然,事实上,这里“所有其他条件”并不是不变的,因而我们的研究涉及解决这种变化给因果推断所带来的问题。

认识到建构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认为建构主义者更倾向于一种整体分析的方法进行解释似乎是公平的。建构主义者对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不以为然,也不认同所有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的观点,他们试图将我们在某项研究中用局部均衡方法来分析的外生变量内生化。^④ 继续上面提到的例子,即使建构主义者有意研究制度变化对政策结果产生的影响,建构主义的解释也不会认为将利益放在一边不做分析是恰当的。相反,他们认为,分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应该是去理解利益和制度是如何共同演变并且可能互为彼此的一部分。反过来,这个方法通过叙述来说明决策的背景,探索那些在关键的历史关头所选择的可行的替代方案。目前,有一种趋势强调某个结果的特殊性,而不是将结果推广到不同类型的事件上。当然,以理论为指导,学者会选择从何处及何时开始分析以及应包含什么要素。即使是建构主义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局部的。尽管如此,一个建构主义的满意解释就是指出为什么被研究的现象会变成目前这样以及为什么它没有

选择其他的路径。

这个分野的任何一方通常都认为另一方的解释不够信服,都有些轻视地认为对方只是“讲故事”或只是一些“数字”而已。^⑤ 但是如果能够用一种开放的视野看待它们,愿意去思考另一种方法的长处,那么局部均衡分析和整体分析方法的确是互为补充的。OEP 分析清楚地“知道”很多具体的、适用范围有限的因素关系,其学者基于信心的多少可以接受或拒绝有关这些关系的一般结论。建构主义者常常注重 OEP 学者必然忽视的反馈效应,阐述对历史偶然性——某些事件所具有的独特的背景层面——的见解。每一种方法及其认识论都对政治事件进行了重要并且互为补充的探索,如果结合起来看,它们毫无疑问要比其中任何一个都更深入、更完整。不过,如果说大量的 OEP 分析加起来将等同于一种整体的解释,或者一种建构主义的解释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比较静态的命题并且得到验证,那也是不可能

^① 在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的推动下,近期在从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OEP)框架内研究的学者与在建构主义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学者之间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参见 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科恩以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来描述这些学派,OEP 的学者主要来自北美,而建构主义学派多是英国学者。虽然这种地理标记并不完全准确,但它的确抓住了每一种学派的某种重心。参见 Richard Higgott and Matthew Watson, "All at Sea in a Barbed Wire Canoe: Professor Cohen's Transatlantic Voyage in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1, 2008, pp. 1-17; John Ravenhill, "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Middl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1, 2008, pp. 18-29; 另参见《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于2008年第12期发表的文章,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2008。

^② Klaus Knorr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③ 戴维·莱克(David A. Lake)和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将此称做“盒子中套盒子(boxes - within - boxes)”的方法。参见 David A. Lake and Robert Powell,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9。

^④ 这里提到的整体并不是指那些有时常用的重结构轻代理人的方法,而是应准确地指明结构和代理人的两面性和递归性,结构和代理人是很多建构主义观点的核心概念。另一个可能的标记是一般均衡方法,但这个方法失去了这个传统核心的动态内涵。

^⑤ 局部均衡分析和整体认识论的区别并不等同于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方法论或者质和量方法的差别。例如,很多 OEP 研究对历史进行案例分析。相反,建构主义者的优势则是在研究中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这种划分并不是一方是否使用了“数字”,而是在于那些数字是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被使用的。

选择其他的路径。

四 中国、开放经济学以及未来的研究议程

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基欧汉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忽视了国际经济以及更广泛的世界政治中动态变化这个大问题。^① 他举例说,这些大变化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的崛起。的确,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开放及其快速增长并没有得到北美 IPE 学者的关注。^② 然而,在笔者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是否提出了理论上的问题和难题,从而超出了 OEP 解决的能力?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的快速崛起是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和成就。其政治领导力和勤劳的人民都值得赞扬,因为它树立了一个勤劳和改革开放的典范。快速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 30 年来使数百万的人口摆脱了贫困。

尽管巨大的市场规模、快速的贸易开放都几乎是中国所独有的特征,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做是全球比较优势格局的一次重大转移。因为有大量的劳动力,中国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本身。这种效应由于中国有意维持低汇率而加剧,但由于其巨额的外汇储备重新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目前过度消费的模式提供了资金,这种效应部分被抵消。或许对那些必须要调整国内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看起来是一个“冲击”,但是到目前为止,事件的发展对理论的影响并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地方。事实上,中国大多数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及其对他国的影响都可以用 OEP 来解释。^③ 据此,笔者认为,只有那些想要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此前的经济力量相比有所不同,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者,才会有压力。实际上,笔者相信当前中国大多数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都可以用 OEP 已有的工具来解释。

不过,中国的崛起的确凸显了 OEP 研究在国际

市场力量与规模收益递增这两个假设上的局限,笔者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下面的例子表明,这些分析上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内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并且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的崛起只是将它们凸显出来,令其更受关注。这两个局限都是源于 OEP 经济理论的最基本假设。

(一) 国际市场力量

第一个局限体现在原有国际经济理论对国际市场力量的强调和对国内市场的忽视。国际经济理论通常建立在“小国”假设的基础之上,即任何一个单元内部的生产与消费与全球总量相比都足够小,因而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所有行动都不会对世界价格产生明显的影响。尽管这个假设一般是以国家为单位阐述的,但更准确地说,这个假设是以产业或产品为单位。对大多数时间的大多数货物来说,这个假设可能并非不切实际。但对中国而言,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很有可能会成为这条规则的一个例外。

长期以来,放松这个假设被认为是打开了政府干预以改善福利的大门,干预的措施包括关税或出口限制,这些措施被统称为最优关税。通过限制进口或出口,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改善其贸易条件以改善国内的福利,甚至会以牺牲全球福利为代价。当代的一个例子是:沙特阿拉伯通过限制本国原油的生产,提高了世界上原油的价格,其所得超出了沙特阿拉伯因不销售其最大产量而损失的收入。尽管最优关税并不是 OEP 的一个核心问题,但由于同样借鉴了上面讨论过的关于利益的经济理论,它们与 OEP 的基本框架并不矛盾,并且可以简单地被纳入国际议价的过程。^④ 事实上,科依勒·贝格威

^① Robert O. Keohane, "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34-46.

^② 中国的崛起是安全研究关注的一个问题。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p. 7-45;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Megumi Naoi, *Contested Forces? Economic Openness and Political Responses to Regional Inequality in East Asia*, Ann Arbor: UMI, 2006.

^④ Joanne Gowa,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尔 (Kyle Bagwell) 和罗伯特·思泰格尔 (Robert Staiger) 认为, 正是为了合力限制这些在国家层面上最优但对全球来说次优的关税, 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 (GATT/WTO) 才得以推动。^①

不过, 放松“小国”的假设并认可国家可以采取某种方式来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 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尽管可以被纳入 OEP 的框架中去, 但这些影响并没有被理论化, 甚至没有得到仔细的思考。这两方面的影响都表明, 国际价格事实上内生于政治, 而不是政治的外生变量, 国际价格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和操纵的产物。

一方面, 最优关税和其他限制措施不仅会导致全球福利的减少, 而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的分配效应。最优关税是通过在较大范围内改变国际价格而实现的。如我们所知, 无论是具体要素模型还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的国际贸易理论, 相对价格的变动将会对国家内部各集团或要素产生不同的效应, 这取决于比较优势的结构。如果国际价格的效应足够大到将租金转移到母国, 那么这种分配效应也就会很大。

例如, 发生在 2008 年上半年的石油价格波动, 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快速经济增长造成了国际石油市场的紧张状况,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出口国利用这个机会减少了石油生产, 抬高了石油价格, 国际市场上石油的实际价格已经接近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的最高水平。价格的上升损害了所有石油进口国的贸易条件, 但是它令使用石油相对集中的国家和产业遭受了更大的损失。由于传统上的低油价以及由此养成的能源消耗浪费的习惯, 美国经济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相比, 其受高油价的影响更大。结果, 集中使用能源的产业(如重工业)要比其他部门受到的打击更大, 而生产耗能产品的产业(如汽车、尤其是燃料效率低下的大型卡车)则遭受重创, 这可能会导致美国汽车产业的最终崩溃。或许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 美国耗能较集中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要大于沿海地区, 前者如美国中西部的北部地区冬季寒冷, 美国南部夏季炎热, 在这两个地区的广大农村, 因为交通距离比较长而耗能较多。^② 虽然沿海地区的汽油价格较高, 但其石油总费用仅占个人收入的不足 5%; 在中西部北边的郊县和南部一些地区, 石油消费可以占到个人收入的 16%, 而后者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上是“红色”,

即支持共和党的州。这也就能够解释 2008 年总统选举中石油价格和政策的政治化现象以及许多高层共和党员们异口同声高喊“钻井啊, 钻井 (drill, baby, drill)”。至少在这种情况下, 由政治因素决定的国际价格尽管从母国的角度看是最优的, 但却会在其他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内部产生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分配效应。

另一方面, 国家也可以通过经济上次优但有政治动机的政策来影响全球价格。改变世界价格所产生的分配效应不仅仅局限于“最优”的进口或出口限制。尽管其意愿并不是以牺牲国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来为本国赚取租金而改善福利, 但由于政治目的的价格扭曲会产生重要的国内和国外效应。

例如, 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农业政策明显造成了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不良扭曲, 不仅这些国家的消费者要花更多的钱购买食物, 而且其他国家的生产者也会因此失去其产品的市场。以食品安全、保存家庭式农场或以传统的特殊利益政治为名, 几乎所有的发达工业化国家都对农业进行补贴。工业化国家粮食的“过度生产”不仅导致进口减少, 对国外农产品需求和价格的下降, 而且通过倾销——常常以“粮食援助”的名义——压低了全球食品的价格。它降低了其他国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利润和积极性, 而这些农民原本可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它还带来了比较优势模式的扭曲。在给定世界粮食价格的情况下, 通常是本会从事粮食生产的小国虽然仍然从事“某种”专业化生产, 但它不是由“自然”所选择的或是能够最好使用其要素禀赋占优的产业。劳动力和土地会被投入到下一个最好的去处, 而不是农业, 本应属于农业的劳动力常常可以在膨胀的服务业找到工作。^③

^① Kyle Bagwell and Robert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② Clifford Krauss, “Rural U.S. Takes Worst Hit as Gas Tops \$ 4 Average,” *New York Times*, June 9,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6/09/business/09gas.html?scp=14&sq=oil+price+share+income&st=nyt>.

^③ 发展中国家同样对价格的扭曲负有责任。尽管由于人为的国际低价导致资源产业被驱逐出农业领域, 但是它们常常不能找到另一个最佳的出口产业, 而最终依靠服务业或非正规经济,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内部政策扭曲可能带来的结果。

由于人为造成的国际市场低价格, 资源被赶出了农业, 这造成了农业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的下降, 进一步导致了公共政策的扭曲。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失败中就可以看到农业价格扭曲的效应。很明显, 将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中获益的国家会努力游说开放工业化国家的市场, 并且为了实现其影响的最大化, 宁可承担谈判失败的风险。但同样重要的是, 农业生产者本应是支持经济自由化的力量, 如今却人为地消失了, 从而无法起到对那些处于比较劣势的部门(通常是制造业)要求停止自由化的制衡作用。由于国际价格的偏袒, 农业无法给发达工业化国家带来足够的改变其政策的压力, 同时, 它也无法带来本国其他产品的自由化以推动发达国家做出更大的让步。发达工业化国家坚持对本国农民保护的同时, 也瓦解和破坏了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一支支持自由化的力量。

政策性价格扭曲对“国外”利益的深刻影响, 在笔者看来, 最好的体现是常被提及的英国 1846 年《玉米法》废止事件, 这是最终消除价格扭曲的实际案例。那时, 美国的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由各部门自行负责的。^① 美国东北部地区是由幼稚工业所主导的, 因而强烈地支持保护主义; 南部则依赖英国市场的棉花和烟草, 因而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 中西部正在快速地兴起, 在为其小麦、玉米以及其他农产品寻找市场, 是尚未表态的中间集团。当英国市场向美国中西部的货物关闭了大门, 中西部站在了东北部保护主义的立场上, 希望按照国内市场的比较优势来推动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增长。这并不是这个地区最优的政策, 而只是一个次优的选择。然而, 当英国废弃了《玉米法》, 中西部立刻又转而与南部结成了自由贸易联盟, 由此开始了一段 15 年的自由贸易时期, 只是由于美国内战才被终止。事实上, 尽管《自由沃克关税法案》在数月前就已经被委员会提出, 但是众议院就该法案的讨论则是在国会得知英国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之后的当天才开始的。能够进入英国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大工业化国家的市场前景改变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形势。

OEP 认为国际价格是外生变量, 因而看不到这些对其他国家政治和政策产生的间接效应。要对选择使用它们的国家和这些政策的目标国家产生深刻的效果, 关税不必达到最优。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政

策性价格扭曲的一般效应。对国际价格的关注允许我们以与 OEP 理论一致的方式捕捉政策效应, 但是想这么做, 首先要放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影响国际市场需求”这一简单化的假设。如上所述, 在国家行动如何影响到相对价格以及这些价格反过来又是如何改变国内利益和政策的问题上, 霸权稳定论以及促使该理论产生的担忧与当代试图对问题进行严格理论化的努力形成共鸣。虽然对霸权的关注没能将其发展为完善的理论, 但是早期的工作仍然可能被证明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议价新模式产生的一片“沃土”。

现在,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潜在的国际市场力量, 无论其市场力量的使用是否属于最优。这种潜力从 2008 年初的国际石油价格急速上涨中可窥见一斑。不管其是不是由现实世界的事件或投机者所造成, 中国及紧跟其后的印度对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潜在的因素。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如最优关税理论所述, 或出于其他原因——很有可能是国内的政治原因——所做决策的副产品, 它操纵价格以获取优势的能力也会增加。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市场力量似乎相对较小, 但石油是个可能的例外。况且, 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工业化国家已经制定好的贸易、金融和货币领域的规则内克制行事^②——即使是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下, 中国凭借其在美国的巨额投资, 本可以为了追求利润而不顾他国的利益而成为一个掠夺者。尽管如此, 中国潜在的市场力量将来有可能会增加。中国很可能与美欧一道, 在未来几年中对某些商品的国际价格产生影响。因此, 这种市场力量该如何驾驭以及会产生什么效果, 都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 规模收益递增

OEP 的第二个局限性是它的分析几乎完全建立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上(例如, 投入增加一倍, 产出也会增加一倍)。在这一点上, 具体要素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贸易理论没有区别。

^① Scott James and David A. Lake, “The Second Face of Hegemony: Britain’s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and the American Walker Tariff of 184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1, 1989, pp. 1–29.

^②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这就意味着，国家会从事产业之间的贸易，有时也被称为“南北”贸易，以便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但是，国际交换有1/4或更多是（取决于如何对货物进行划分）产业内的贸易或者是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为了解释产业内部贸易在现代的大增长，经济学家们建立了复杂的生产收益递增模型（投入增加一倍，产出会不止一倍的增加）或规模经济模型。这些模型显示，即使在要素禀赋、技术和消费者品味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国家间的贸易也会出现。内部规模经济（具体指公司）会导致不完全竞争（垄断或垄断性竞争）和相似产品的国际贸易，外部规模经济（具体指产业）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带来完全的专业化（取决于国家的初始规模）。

对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来说，生产的规模经济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专业化格局以及因此产生的任何分配效应都是不确定的。例如，在条件相当的国家之间，专业化完全取决于随机的扰动（random perturbations）。同样，国家规模的细小差异也可能会成为哪个国家在哪些方面专业化的决定性因素。在一篇未发表的重要文章中，罗纳德·罗戈斯基（Ronald Rogowski）对贸易规模经济的分配效应进行了据我所知非常严肃的探究，^①他推论出：政治分裂和冲突更易于出现在规模收益增加和不变的产业之间、贸易货物生产者与非贸易货物生产者之间以及——如果资产专属于某个产业甚至是“不动的”——国家内部在职的工人和退休人员/消费者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可能是不同的种族之间；政治斗争将集中于社会福利政策、产业政策、移民和外资政策、政治制度、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小）和超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关税同盟等）。然而，这些分裂在某一个国家是如何出现、斗争又是如何展开的，取决于偶然的初始条件或任何导致一个国家的生产者相比较其他国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的来自世界某个角落的冲击。同样，克里·蔡斯（Kerry Chase）^②和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③认为，规模经济产业是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的一支力量，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最优规模以及这个地区内国家的大小（代表消费者的需求）。

鉴于结果对条件的敏感性，政府政策也可能会产生一个重要的效应：“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20世纪80年代产业政策的很多颂扬者都持这种观

点。^④政府可能会试图保护由于一次随意但却决定性的“冲击”而处于劣势的公司或产业，也可能会试图抓住对其他生产者的竞争优势，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战略贸易理论”。^⑤无论哪一种情况，专业化格局都会带来分配效应从而促成“利益”的产生——即所有OEP分析的基础，因而专业化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现象。对规模经济贸易来说，至少利益不能够再被看做是政治的外生变量，而是政治的产物。这大大削弱了曾经给予OEP很大解释力的核心分析方式。对规模经济贸易的分配效应进行充分的说明将会对OEP未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其分配效应如同当前理论所示对初始条件和政府行动那样敏感的话，那么未来的研究重点则是很多建构主义者长期以来所强调的回归和路径依赖因素。

同市场力量一样，正是其干预规模经济产业的“潜力”引起了当前对中国快速崛起为一支国际经济力量的关注，至少在政策分析家们中间是这样认为的。其他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了对幼稚产业的暂时保护组成集团企业，拿出国内产生的大量收益来进行大规模的新投资，对拥有高额固定成本的产业提供政府补贴，以超越北美和欧洲的生产商，因而给这些产业带来了大量递增的规模收益。在钢铁、汽车、造船和其他领域，日本和韩国先后使用了国内集中和选择性政府刺激等组合措施以获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规模效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任意将

^① Ronald Rogowski, *How Economies – of – Scale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② Kerry A. Chase, *Trading Blocs: States, Firm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③ Helen Milner, "Industries, Governments, and Regional Trade Blocs," in E. Mansfield and H.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John Zysman and Laura D. Andrea Tyson, eds., *American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Corporate Strateg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⑤ James A. Brander and Barbara J. Spencer,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8, 1985, pp. 83 – 100; Paul R. Krugman, e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比较优势转移到它们一边。^①虽然中国缺少像日本和韩国那样的企业集团，但是中国庞大和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及其众多的国有企业，同样为中国创造了大量新投资的潜力，为中国制造业超越现有规模经济生产者提供了条件。从政治上看，这种潜力在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引发的担忧可能要大于美国和欧洲，后者早已经放弃了这些规模经济产业的比较优势，或者成功地适应了新形势。如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从事着产业间的南北贸易，得益于其大量的劳动力，但中国政府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在未来转向规模经济产业。向规模经济生产的推进究竟会对其他国家带来怎样的冲击，这不仅取决于所选择的产业和进行的投资，而且还有赖于相对于国内市场的最佳生产规模。作为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日本和韩国在最早向规模经济产业投资的时候，除了依靠出口获得最低的有效生产规模外别无选择。中国则更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能够通过国内市场来实现最低水平的规模效应，至少在某些产业如此。市场力量的潜力是明确的，但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政策的净效应如何就不确定了。

关于规模经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尚有很多不明之处。要想完全清楚中国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影响，知道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还需要关于政府政策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成功推动规模经济产业发展的更完善的理论和更全面的数据。因为规模经济贸易很难被理解和预测，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大多选择了忽略，但这并不是说它变得不重要了。尽管这个问题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规模经济产业比较优势潜力的重建而变得更加突出，它的解决也会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众多领域的问题打开新的思路。

五 结论：为什么是开放经济学？

30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交叉学科，结合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部分精粹。从不同方法相互竞争的混乱之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在用一种核心的方法来构建知识、提出疑问、找到可能会丰富未来研究的领域。开放经济的政治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仍不完美。它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扩展，事实上，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实现。不

过，OEP 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方法，它预示着未来的回报。

在笔者看来，有三个原因使OEP成功地主导了北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OEP有强大的实证基础。从其诞生之日起，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关注国际经济的历史趋势，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分析家们一般都很小心地避免把某个历史片段错误地看成世界上所有可能状况的典型，而是尽可能地挖掘丰富的历史以验证他们的理论。另外，他们还投入大量精力为贸易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汇率机制等问题设定恰当的指标。在很多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初局限于案例研究或者最多是基于有限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现在一些最新的研究采用了大量的时序数据和计量经济学工具。但是，无论是采用什么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一个强调实证的科学。第二，OEP强调演绎的严谨。政治学家尤其是从强大的经济学理论中获益良多。反过来，这也促使经济学家严肃看待政治学和政治制度，并且将对政治过程更现实的理解纳入到他们的模型中去。学术争鸣促使各方清楚阐明假设，揭示长处和局限性，以可证伪的方式清晰地陈述命题，从而将观点放到实证中去检验。通过遵循科学探索的统一标准，实现学者间的互动和知识累积。第三，OEP借鉴了广泛的理论并与之融合。理论家将他们的分析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政治制度理论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将OEP与更广泛的研究计划联系起来，推动了理论的“杂交”，而且避免了分析家每次坐到电脑前面都要另起炉灶的情况。

现在，理论要严谨并应受到经验与事实约束的规范已经被深入灌输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中间。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过去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样，笔者也对这个新兴跨学科的未来感到乐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郎平翻译）

[收稿日期：2009-04-09]

[修回日期：2009-06-03]

[责任编辑：谭秀英]

^① Stepha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